

第一章 中国经济的崛起

突然，党政不同部门以及意识形态学校的干部以 1949 年以来没有先例的专注精神，倾全力大笔挣钱。

中国报纸报道说，20 万党员下海了，成了“红色资本家”。中国各地的军队单位，包括军工厂、港口、航空港和运输部门，与民间的公司和外国的公司签订了办合资企业的合同。

上周，据说某省委党校倡议同香港一家商行签订合作生产竹子工艺品的协议……

香港商人说，党内元老的女儿们正放弃从政，而代之以用关系换大钱这种比较安全可靠，又有利可图得多的行当……

同样有重要意义的是，中国老百姓也掀起了快快发财的狂热。他们正把全民皆商付诸实施。

——引自《南华早报》1992 年 8 月 5 日所载成利·沃-拉普·拉姆的文章《邓挑起了社会主义思想的发财情绪》

在过去两千年来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一直站在世界技术和收入的顶端。诚然，中国曾是如此强大，致使它的人民习惯于认为他们的国家是中央王国，是一切围绕着它转的中心。但是，过

去两个世纪里，中国人经历了外弱内散的岁月，人民生活在不堪言状的贫困之中。

一直到 80 年代初，有 1 亿多中国人仅靠比在纽约吃一顿像样的饭还要少的年收入维持生计。即令今天，还有大约 4000 万人生活在东北* 的窑洞里，中国 1903 个县中有 520 个县的人民年收入低于人均 35 美元。这样一种令人绝望的境况造成了中国许多农村地区出现一家一条裤子的现象。一条裤子的家庭在中国十分广泛，这是指只有足够的衣服供一名家庭成员穿用的家庭。中国的社会学家曾对此作过研究，但研究的结果从未在西方发表。值得注意的是，男人白天要穿上裤子到地里干活，女人只好躲避起来，女人到晚上才穿上裤子。另一种做法是，村民由于太穷，没有衣服穿，就用焦炭把自己涂黑，给人穿上了黑衣裳的错觉。

所有这一切都正在成为过去的事情。随着执行邓小平 1979 年经济改革计划而开始的中国的经济起飞，正以以往仅限于南朝鲜、台湾、香港和新加坡的速度，消灭这样的贫困。事实上，这一中国现象在历史上似乎是独一无二的。在 80 年代，中国的经济在世界上增长得最快。在 80 年代后期经过短暂的反通货膨胀时期以后，中国的经济于 1992 年又再度成为世界上增长最快的经济。以前，这一类的成绩似乎局限于较小的国家和地区（只有 600 万人的香港、200 万人的新加坡和 2000 万人的台湾）或者人口构成极其统一的国家（南朝鲜和日本），或者人口不多的经历暂时的商品繁荣的国家（70 年代时的沙特阿拉伯）。在中国取得这一成就之前，人们一直认为，占世界人口 1/5 且经济极其多样化的一个国家，是不可能取得如此迅速的增长的。

中国的经济繁荣正在改变亚洲的经济态势，例如，1991 至

原文如此，疑为“西北”之误。——译者注

1992年，正当美国和日本经历严重的衰退时，中国的繁荣刺激香港相应地繁荣，并使台湾迅速而成功地作了调整。中国沿海地区的成功和正在出现的高生产率将向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斯里兰卡这样的国家提出严重的挑战，它们现在要么加快自己的改革计划，要么在竞争力更强的中国人面前失去贸易和外国投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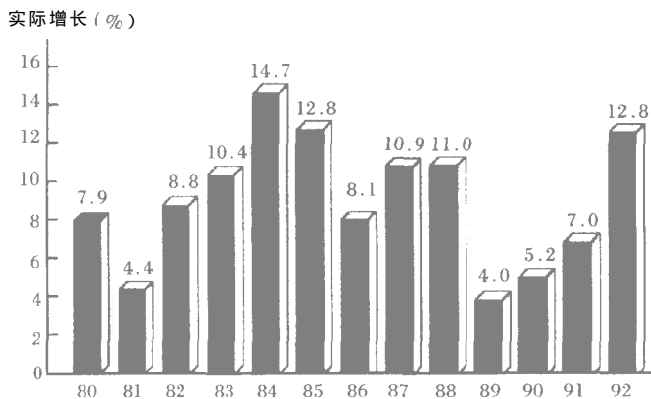
中国的经济繁荣还产生了其他后果。这一繁荣已经在改变中国的政治，并有希望令亚洲乃至全世界的政治改观。经济上的成就使改革派掌握主动权。它使沿海地区掌握了压倒内地（包括北京）的主动权，并在一个革命后始终以“政治是统帅”为中心口号的国家里，使经济压倒了政治。它还使中央放松了对各省、国有企业、地方和部门经济活动的控制，首先是放松了对个人的控制。它还使中国广泛地展现在外界面前，以致在沿海地区、许多大城市以及实际上在所有的大学和研究中心发展了一种世界主义的文化。它还至少使四代人（80多岁的领导层，65岁左右的一代人，50岁的一代人以及45岁以下的一代人）的观点产生了惊人的分歧，而每一代人都决心更快地实行改革。

在国际上，中国闭口不谈它的一切冲突和地缘政治野心，以追求经济上的成就。它已停止推进海外的革命，与所有邻国修好，把军费降到很低的水平，把军队裁减了将近100万人，实际上同所有国家和地区（包括台湾这样的意识形态上的对手）展开贸易，向北朝鲜施加压力，以保持朝鲜半岛的和平，同它所有原先的敌人，包括南朝鲜在内，建立了正式或者非正式的外交关系。

经济成就

所有这些政策都是为经济增长这一目标服务的。这一目标现在达到了。在改革开始后，中国的增长迅速提高到 10% 的年率。1988 和 1989 年为了处理高得无法承受的通货膨胀而作的努力，引起了速度的短暂下降，降到了 4%，这个速度西方国家也仍然会认为是繁荣。1991 年再次上升到 7%（近年来，作为一个集团，亚洲国家的奇迹经济都达到了这一水平），而在 1992 年，又提高到 12.8%。1992 年，北京规定今后 5 年的目标是年增长 8—9%。在不发生令人无法承受的通货膨胀的情况下，这个增长速度能否保持，尚需拭目以待，但是，中国增长 7% 以上的能力看来是可靠地

图 1-1 国民生产总值的实际增长：改革后的中国



来源：国家统计局。

确立了。

中国的经济成就不仅局限于原始经济增长。1992年，外贸额上升到 1660 亿美元。这表明，中国已摆脱自给自足状态，成了世界主要贸易国之一。出口从 1979 年的 148 亿美元猛增到 1992 年的 850 亿美元。不仅出口额增加了，出口产品也变得更先进了。1985 年，制成品只占中国出口的一半，而 1991 年制成品占全部出口的 3/4 以上。^④中国在出口增长的同时，近来贸易有大量顺差。

中国在前 10 余年的改革中吸引了 200 多亿美元的外国投资，包括 30000 多家企业，比第三世界任何其他国家都要多得多。作为比较，从 1985 至 1989 年，第三世界国家中唯一幅员可与中国相比的巴西吸引了 61 亿美元的外国投资，而中国吸引了 91 亿美元^⑤。仅 1992 年一年，外国投资者向中国投入了 112 亿美元，并签署了 575 亿美元的未来投资协议。1991 年年底，37215 家外资企业生产了 120.5 亿美元的出口物资，占中国全部出口的 17% 弱。仅 1992 年一年，政府又批准了 47000 个外资项目。^⑥在这样一些数字成为现实之前，严肃的经济学家不大会认为是可能的。

通货膨胀虽然不时成为一个严重问题，但是最高只及南朝鲜 70 年代后期所达到的水平的一半，只相当波兰和前苏联的 1%。

成功的基础：中国相对于苏联

中国和苏联所取得的成就的差异来源于两国深为不同的经济和政治战略。大多数西方人相信这样一个神话：中国不过是贫困的前苏联的翻版而已，中国将不可抗拒地步苏联失败的后尘，原

因是两国毕竟都是共产党国家。事实上，中国一直遵循的发展模式，与其说与它的前共产党伙伴国相似，不如说与南朝鲜相似。中国的战略具有亚洲特色，是以对亚洲邻国和地区，特别是以对南朝鲜、台湾、香港和新加坡的分析为依据的。对于西方采购者来说，有明确的证据表明这一点。在我们的主要百货商店里，鞋类、衬衫、运动衫和玩具，一度都标明“韩国造”或者“台湾造”现在大多标明“中国制造”。几乎没有什么东西是“俄国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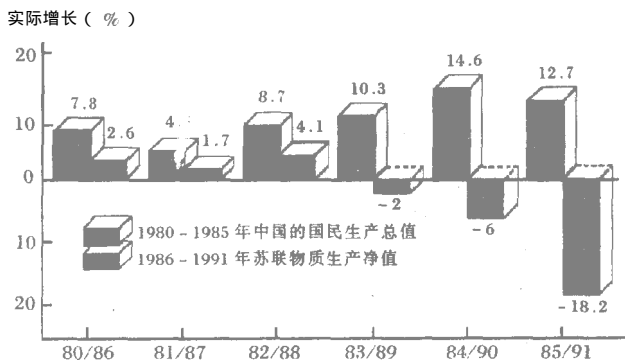
那时，邓小平和他的同僚从相邻的小国的教训中得出了四个领域的高超的战略。这四个领域是：经济、政治、行政管理和金融市场。

经 济

遵照所谓新兴工业化经济的榜样，中国人优先重视政府有限的投资能带来迅速增长的工业和部门。第一，他们把农场交还给农民，使生产率、收入和产出大量提高，而国家的投资微乎其微。国家的作用主要局限于发布法规和利用现在的行政机构来执行它的决定。第二，中国大力促进外国投资。虽然有关外国投资的刺激措施和法规还有待于进一步改进，但是这些措施和法规非常优惠，足以吸引上面提到的大量外国投资。这在产出和出口两方面产生了巨大收益，而政府所花代价又是微乎其微的。最后，中国优先考虑轻工业和中型工业，这类企业可使有限的起始投资很快获得巨大的产出。正如台湾和香港 60 年代和 70 年代时用纺织品、服装、鞋类、玩具和电子消费品充塞世界市场一样，中国在 80 年代和 90 年代很快成为生产同类产品的全球性力量。正如较小的亚洲国家经济起飞时一样，这样的政策使经济迅速增长，并使消费品生产、个人收入、出口和外汇收益猛增。

相比之下，苏联忽视农业，因对外国投资抱有很重的矛盾心理而很少吸收外资，把过多的注意力投向重工业。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早先的计划强调大量进口设备、制造更多的机器，强化对机床的使用，由一些超级部来安排工业。改进石油工业以及改组汽车工业和高技术部门。所有这些都是资本密集型产业。后来就私有化展开的辩论也是把过多的注意力投向需要大量资本和耗费时日的产业，而不是投向成本低和能迅速得到回报的领域。^⑧这样的优先考虑在苏联的历史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中随处可见。它们反映了以马克思对 18 世纪英国的分析为基础的过时的发展观，反映了苏联对与军队有关的重工业投资过多的势头。但这些政策的失败，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过早地把重心置于西欧的，特别是美国的教授们所鼓励对国有大型企业实行的私有化上。

图 1-2 中国和苏联的增长 改革的前 6 年



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国国家统计局。苏联的“物质生产净值”最接近于“国民生产总值”。

苏联的这种战略（以及其他一些东欧国家，最突出的是波兰的战略）的结果是，生产崩溃，同时又出现令人无法忍受的通货

膨胀。一位著名学者争辩说，戈尔巴乔夫在经济史上取得了一个第一：由于供应不足，而不是由于需求不足而引起萧条。^⑨许多东欧国家也出现了类似的结果。

我们不应感到意外。中国革命不论有多少缺陷，它是深深扎根于农民社会中的，而苏联革命不过是一场粗暴地从上强加于人的。毛泽东的遗产的继承人自然指靠来自下面的活力，尽管毛泽东看不起给群众以特殊活力的私人企业和外国的存在。对群众的主动精神的依靠走入歧途，导致了中国的土改和文化革命的平均主义。然而，把群众的主动精神引向致富之路，它就会为世界上数以千万计的最穷的人提供衣服、住房和粮食。结果，中国改革后的增长曲线像是飞机起飞，而前苏联则像是潜艇下潜。

中国战略的一个重要后果是为最需要工作的人创造了数以百万计的就业机会。在这个战略中，增长和收入的中心在于普通农民和普通工人。例如，大批工人生产出廉价的衬衫，他们也获得了为自己购买若干件衬衫的收入。相反，苏联或者拉丁美洲把注意力集中于重工业，只创造数目少得多的高薪就业机会，而使大批劳动力失业。再者，像钢铁这样的产品对人民的生活并没有什么直接的影响。中国的战略造就一个广大的消费者新阶级，他们穿着现代的服装，使用现代的生活设施。普罗克特和甘布尔（P & G）公司委托进行的市场调查表明，数以千万计的中国人现在已花得起 5 美元买一瓶飘柔牌香波。中国的广东省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普罗克特和甘布尔公司的香波市场。爱芳公司有 18000 多名女推销员，她们在广东省挨家挨户推销西方式化妆品的活动也很成功。把中国视为世界上制造电子设备最佳地点的摩托罗拉公司预计，中国将成为该公司在世界上第二代无绳电话的第二大市场。^⑩所有这一切使一个社会革命化，而这个社会里的 10 亿人民仅在 10 年以前还穿着相同的邋遢的蓝外套，留着相同的发型。

政 治

改革是一个国内政治进程。像土耳其的凯末尔这样的伟大改革家把改革分成几个可以操作的阶段，在每一个阶段，建立起视改革为服务于自己利益的人政治上占压倒优势的联盟。而像伊朗国王那样不成功的现代派同时让那么多的集团对抗，以致它们都被反对势力压倒。在这方面，邓小平是一位堪为楷模的改革家，而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则是一个失败的漫画式人物，虽然他也算是 20 世纪的一个杰出人士。值得指出的是，西方的许多批评家赞扬戈尔巴乔夫一下子什么都做的战略，并攻击邓小平的谨慎地分先后次序进行改革的战略。历史上的改革派，从奥地利的约瑟夫二世到中国的光绪皇帝，他们一下子实行一系列改革只是把反对派动员起来，而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目的落空。^⑪

邓最初的农村改革使中国农民的收入翻了一番，赢得了 8 亿多人的支持，对于争取同盟者来说，这是一个不坏的开端。^⑫接着，他为一个小企业主阶级的崛起提供了方便，刺激了轻工业和中型工业的起飞，从而又赢得了几千万工人和管理人员的支持。在这些集团中有胜者也有败者，但大多数人是胜者，这是一个关键的政治事实，胜者人数众多，几乎把一切生气勃勃和最充满活力的人都包括了进去。邓使中国的财政制度革命化，放松了对中国知识分子和大学生旅行和思想交流的控制，从而又把人数不多却极有影响的一批人争取了过去。

邓小平甚至争取到了大多数军界领导人对经济改革的支持，尽管他大大压缩了军事预算，以为经济的迅速发展提供资金。1979 年正巧是改革开始执行的一年，同时又是中国由于越南介入柬埔寨事务而同越南发生冲突的一年。中国虽然达到了目的，但是，它

的军队却受到越南的重创。邓成功地让大部分领导人相信，军队唯一的出路在于搞到西方的武器。这要求经济上取得成就，为贸易提供资金，要求同西方国家和解，以获得武器，并要求大力削减军队的预算和人力，从而为国内经济的进步提供资金。在改革时期，中国军界事实上是不愉快的。除了人员和预算的大量减少外，他们觉得在收入方面远远落后于社会其他阶层，他们得去做生意以支持他们自己。但总的说来，他们是在改革最坚定的支持者之列的。

同样，政府和共产党的大多数领导人成了改革者。在经历了大跃进（1958至1961年）和文化革命（1966至1976年）的悲剧之后，激进的理论家声誉扫地，党的最高级领导人知道，他们必须采取一些完全不同的做法才能挽救国家，拯救他们自己。在所有80多岁的人中，陈云实际上领导了改革的第一阶段，从不鼓吹80年代初他主事时取得的巨大成就。较年轻的李鹏也发表了谈社会主义股票市场优点的讲话。有些最高级领导人强烈地相信，市场是国家的正确方向。另一些人发现，只有提供经济上的好处，才能保住他们的选民，而他们做到这一点的唯一办法，就是通过改革来提高效益。同时，这两批人的家庭和高级军官的家庭由于所处的特殊有利地位而赞成改革：他们可以利用关系，在市场上挣钱时获得特殊的好处。这样一来，无论是出于理想主义、权宜之计还是腐败的目的，这个国家的掌权的精英们都成为改革的支持者。

80年代末，极端的社会主义派大多局限于宣传机构，1991年下半年和1992年，邓开始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甚至把他们从这些岗位上撤职。在年轻一代有前途的领导人中，在走向以市场为方向的改革上，有的人走得慢一点，有的人走得快一点，但是没有人走回头路或者踏步不前。

化的市场民主，同样是无效的。⑬

行 政 管 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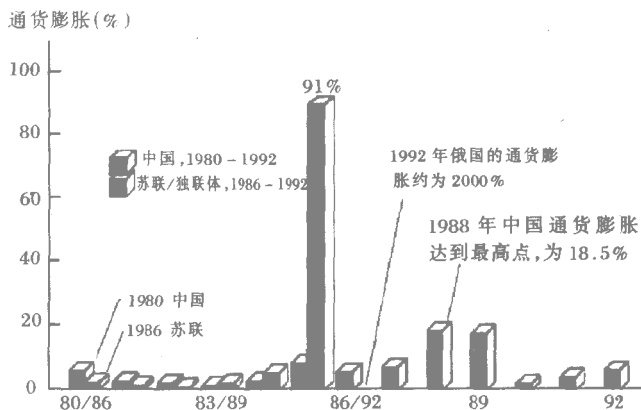
中国强调逐步地、仔细地安排好次序的改革。前苏联和东欧则更多地为忽冷忽热的态度，特别为波兰大事张扬的做法所吸引：仓卒地实行价格自由化和企业私有化。突然实行自由化的风险是出现令人无法接受的通货膨胀和货币价值暴跌。一夜之间实行私有化，会在经济上造成混乱。例如，戈尔巴乔夫时代的沙塔林计划在西方广泛得到认可，它设想要在 500 天内使苏联大部分工业私有化。为这一计划叫好的教授们会立即承认，要在不到两年时间内改变纽约或者伦敦的所有大公司的所有权和管理的一项计划，只会导致混乱和崩溃。

中国方式的理由是，价格自由化的尺度必须是避免出现引发恶性通货膨胀、货币价值暴跌以及对经济改革产生政治上的失望感的恐慌。在社会主义所特有的供应严重短缺的情况下，突然放开价格会直接导致恶性通货膨胀。波兰突然放开价格使得 1989 年最后 4 个月的通货膨胀率超过 2000%。⑭前苏联 1991 年的通货膨胀为 91%，1992 年约为 2000%。同时，它的货币价值暴跌达到了潜在的灾难的程度。⑮

这样的事态发展的社会后果是严峻的：例如，1992 年 6 月，俄国的农场垮台了，因为“新设备的价格等于一年前的 70 倍，而牛奶的价格……只上涨了 7 倍。……自由市场上的饲料价格达到难以想象的地步。”⑯严重的通货膨胀把国内和外国的投资都吓跑了，从而毁掉了这个国家经济增长的潜力。通货膨胀本身即可引起不必要的广泛的破产。到 1992 年初，这类问题在整个东欧和前苏联使人们在政治上（在这种情况下，是对民主）普遍感到失望。

到 1993 年年中，波兰的比耶兹察迪地区出现了饥荒，大多数选民表示赞成共产主义。^{①7}

图 1-3 中国和苏联的通货膨胀：可供比较的改革年份



来源：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1992年2月。

中国是逐步放开价格的，并像印度尼西亚等亚洲国家一样，一直小心翼翼地确保大米价格的稳定，使之不致危及仅够糊口的农村居民。在价格放开期间，中国建立了相应的制度，使国家能控制通货膨胀，亦即控制信贷和证券市场。结果是实现了迅速增长，通货膨胀周期处于可控制的水平上。中国的通货膨胀从未超过 20%（大部分人所居住的农村地区不到 20%，大城市里将近 40%）。

中国对于私有化一直格外谨慎。如果在价格改革完全就绪之前实行私有化，许多公司就会破产，原因不在于它们效率不高，而在于它们的产品价格定得低于市场水平。例如，有些社会主义国家把煤这种商品的价格定得只及市场价格的 5—10%，这不是什么不寻常的事。如果突然失去补贴，而且不得不按市场价格支付

它的投入，按远远低于市场的价格出售煤炭，煤炭公司很快就会破产。大事张扬的价格自由化实际上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因为一种有效的自由价格制度并不只是意味着立即放开价格，还意味着有一个能够接受价格信号、分析价格趋势和采取相应行动的制度网络。这样一个网络要花多年时间才能形成。正如在混乱的自由化早期阶段的典型情况所显示的那样，如果在通货膨胀率高、增长率低的时候迅速实行私有化，就会恰恰在经济最缺乏吸收富余工人能力的时候，造成大量失业。

重要的还有，过早地实行私有化有可能使退休职工挨饿，因为在许多这样的制度中，退休金是由企业支付的。这也会剥夺长期工作的雇员的权利，他们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有权享受公司提供的住房、退休金、医疗和教育等福利，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他们本可挣钱置一个自己的家，现在却突然发现自己无家可归，一无所有。这样的私有化还会使银行体系垮台，长期以来，银行一直在向亏损的国有企业提供越来越多的“贷款”，以便它们维持下去。

最后，一个有效的全国性私有化计划要求有股票市场，要求由分析人员来评估公司的价值，由经纪人来传达这种分析和经管股票交易。没有这样一个制度来评估效率、分析经济趋势、广泛地交流所发现的情况和有效地从事贸易，资本主义是运转不了的，而且会产生比社会主义还要糟糕的结果。因此，中国选择了推迟实行私有化，直到它成功地放开了价格，建立起全国性的退休养老制度，提供了替代的医疗制度和教育制度，实施了银行的重大改革和建立起切实可行的股票市场。中国改革的特点是，它使它的货币处于接近市场的水平，在比南朝鲜或者台湾早得多的改革阶段就把股票市场向外国人开放，但又比东欧人下大得多的决心去建立使市场正常运转的必要制度，然后才进行所有制的广泛变革。

受到西方批评量多的，莫过于这一放慢私有化的政策。然而，

对于中国的成功起的作用最关键的，莫过于它奉行的逐步和稳妥地为成功的私有化奠定基石的政策。心血来潮地对主要工业实行私有化会招致生产的暴降，从而使外国和私人投资者裹足不前。形成对照的是，中国集中精力于刺激外国和私人投资者进行大量投资和生 产，然后利用新的生产来减轻人民的贫困，为解决国有部门的问题提供资金。

中国经济成功的主要象征是：小规模经营的农民骑着他的新摩托车上市场，青年男工穿一件他自己工厂生产的带有小小鳄鱼标志的衬衫，女工在干了一天活，组装青少年喜爱的“忍者神龟”玩具和西方文化其他顶尖玩物之后，试着用她的新化妆品。而俄国经济战略的主要象征，则是一个感到困惑的家庭主妇拿着一捆可用来购买国有企业的证券，而这些证券或许是一笔有价值的退休金，或许连在农村度一个周末的代价都不值。

金 融 市 场

中国也已经建立了经管市场经济所必需的基础金融市场。在经历了 1988 至 1989 年严重通货膨胀之后，政府认识到，如果能把货币供应量控制住，即便价格放开，通货膨胀也是有可能控制住的。在执行一项明智的紧缩财政和信贷的政策的前提下，控制的关键是债券市场：以吸引人的利率发放的债券可以吸收有可能助长通货膨胀的多余的货币。政府随后采取的鼓励证券市场，对证券市场加以管理以及决定性地采用高实际利率的做法，已被证明对于控制 1988 至 1989 年的通货膨胀是成功的。北京现已拥有世界上比较现代化的电脑化证券交易系统。

中国还正在迅速发展它的规模仍然很小的股票市场和期货市场。股票市场将把储蓄动员起来用于生产，并以竞争的方式来配

置这些资金。他们还提供了一种方法，以顺利地把外国资本和当地资本融合起来，以创办合营公司并最终使绝大多数国有企业私有化。他们还将培养一批能对公司作出评估的训练有素的会计师，还将建立一个全国性的信息网，以便有效地传播经济和市场信息。期货市场将有助于确保价格稳定，确保价格的可预测性和了解价格受控制的商品的价格的流向。

中国领导人在做所有这一切时，显示了对市场体系制度上要求的卓越洞察力，并周到地构想了建立起必要制度的一系列步骤，同时又避免了致命地损害价格的稳定、社会福利或者对未来经济改革的政治上的支持。他们犯过许多错误，但是到目前为止他们的分析表明，西方所赞赏的心血来潮的战略在智力上破产了。首先，中国的经验表明，一个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确实可以走向市场制度，而不致引起社会灾难，如果世界只经历俄国和东欧的办法，这个结论会是很令人生疑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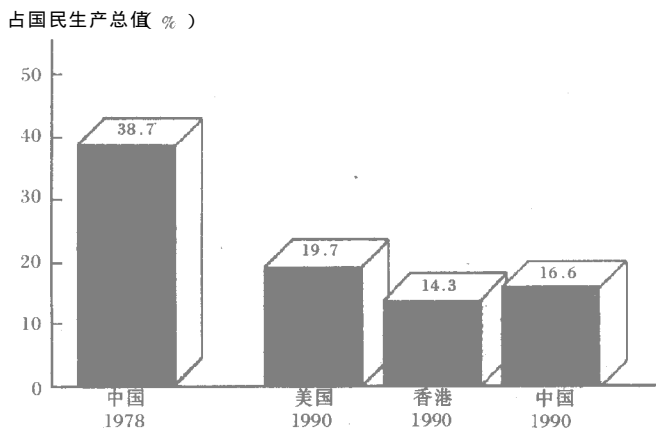
经济改革的程度

中国的经济改革同东欧所偏爱的、大事张扬的做法相比，是循序渐进的；虽然如此，中国的经济改革并不慢，规模也不小。表明改革规模的一个指标是，到 1992 年，绝大多数的价格都放开了。1990 年，在全国范围内，“农产品总销售量中只有 25.2%，工业品总销售量中只有 44.4%仍属于国家指定的价格，而在 1978 年相应的指标是 94% 和近 100%。”到 1992 年，“70% 以上的消费品和生产材料的价格已经由市场决定，^⑩甚至农业和工业的许多投入的价格（这是敏感问题）1992 年已经不受控制。

1992年9月1日北京进一步放开了除年些时候的72种中的111种生产材料之外的所有生产材料的价格，并把其他22种材料的价格交由地方控制。^⑩在中国带头实行改革并远远走在内地省份前面的广东，到1992年，85—90%的价格是市场价格，只有32项仍受价格控制。^⑪北京已经放开了某些最敏感的价格。北京在全国范围内放开了糖的价格，大部分沿海地区不再控制粮食的价格。华盛顿仍然管制糖的价格的程度，东京管制大米价格（8倍于世界市场价格）的程度以及法国管制许多食品的程度，都表明了这些价格政治上的敏感性。北京采取的政策是，国家控制的价格逐步上调到大体达到市场的水平。虽说价格改革还有漫长的路要走，中国已确认，这样的改革可以成功，而不致引起东欧常见的那种灾难。

衡量社会主义被撇在一边的程度的一个尺度是，进入中央政府国库的经济的比例。在一个真正社会主义的经济中，如改革开

图 1-4 中央政府的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



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家统计年鉴，1991年》。